

“去殖民化”与“本土意识”的媒介建构

——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的“澳门叙事”

曾一果

澳门长期处于中西交汇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中国、葡萄牙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政治深刻影响着澳门在世界上的城市形象。1987年3月26日,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草签了《联合声明》,澳门逐渐迈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澳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本文即以1987年创刊的澳门一份著名杂志《文化杂志》的“中文版”为研究对象,关注这份杂志创办以来关于澳门的“历史叙述”,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身份认同的转换,探讨该杂志的澳门叙述如何从去殖民化叙事、回归叙事到本土意识觉醒的嬗变历程,并分析这一历史叙述背后国家、民族和地方间复杂的权力关系结构。

本文为2011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批准号:11TQC008)和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批准号:2011SJB860003)阶段性成果

城市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今的显学。中国学术界近些年来多将目光集中于北京、上海、香港等大都市,澳门却少有关注,它给世人的印象似乎仅是“赌城”,其实不然。在中国近代史上,澳门的地位举足轻重,长期扮演中西方交往的重要“媒介”,中西不同文化在这里不断地交汇、碰撞,形成了多重文化景观。

1987年3月26日中葡草签《联合声明》,澳门的主权将交还给中国,澳门从此迈向一个新时代。在此背景下,澳门发生了哪些变化?中葡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影响澳门的身份呈现的?由于影视、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叙述和报道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城市认知,本文拟以澳门本地的一份重要期刊《文化杂志》“中文版”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叙述与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考察由此杂志建构的“澳门叙事”,进而揭示不同权力关系中澳门身份认同的可能与转换。

一、去殖民化政策与《文化杂志》的创刊背景

《文化杂志》是一份具有浓厚官办色彩(由澳门文化学会主办)的综合性文化类杂志,创刊于1987年3月,以季刊方式出版。澳门文化学会成立于1982年,是今天澳门文化司署的前身。杂志创办时以葡语、英语和汉语三种文字发行,首任主编为葡人官龙耀,杂志内容广博,涉及澳

门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艺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澳门历史和文化风貌。

《文化杂志》的创办首先得益于澳门经济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澳门经济腾飞,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1976—1981年,澳门的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6.7%,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早的地区之一。1984年,澳门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78亿澳门元,相当于10亿美元;1983—1984年澳门的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2800美元,在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52位,在东南亚排第5位,仅次于文莱、新加坡、香港和台湾。”^①经济繁荣推动了澳门文化和传媒产业的发展。以华文纸媒为例,除《澳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和《市民日报》四大老牌报媒之外,出现了许多新的报媒。如1982年《正报》创刊^②,1986年《澳镜》杂志创刊,1988年《澳门研究》创刊,1993年《澳门月刊》创刊。《文化杂志》就是在这样一种城市文化需求氛围中创办的。

其次《文化杂志》的创刊还与葡澳当局的“去殖民化”政策有直接关系。葡萄牙占领澳门后,长期实行“殖民统治”,派遣总督、在澳门驻扎军队,将澳门看成是葡国领土。但20世纪以来,亚非殖民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运动,使整个世界的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在60、70年代中国“文革”的影响下,华人与葡澳当局冲突不断。1966年12月爆发了“12.3事件”,在事件中多名华人市民受伤。施白蒂将冲突归咎于“‘自由’概念冲击着澳门当时实行的‘殖民地’概念”^③。华人高涨的反抗风潮,迫使殖民当局不得不调整“殖民政策”。为了改变殖民政府在华人族群中的负面形象,葡澳当局开始考虑放弃“殖民主义”。1976年葡萄牙新政府颁发了《澳门组织章程》,公开承认“澳门主权属于中国”^④。1979年中葡建交,1987年3月26日中葡草签《联合声明》,确定澳门主权于1999年正式移交给中国。

《文化杂志》即在1987年3月创刊,这显然并非巧合。葡澳当局意识到对澳门实行政治殖民统治已经失效,必须改变策略,于是想到了文化。《文化杂志》“创刊号”刊登了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的这样一段“讲话”：“终于,我们将推行一条符合澳门实际、重视澳门独特价值的文化政策。澳门是不同文化汇聚之地,数世纪以来,中西文明和睦共处,互相尊重。”^⑤新政策即“以文化为主,政治为辅”的统治策略,但是“终于”一词说明,葡萄牙对澳门采取新的文化政策,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于现实环境的压力。《文化杂志》第2期发表的《联合声明与澳门文化复兴》一文,要求人们“不应该偏重战事、武力和统治”,而要以更高的文化视野看待葡萄牙的“远东史”^⑥：

十九世纪的反殖民主义,即由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争取独立,纯属政治冲突现象。同宗主国的决裂没有导致文化的变迁,仍旧保持欧洲文化,因为当地土人没有参与欧洲殖民者与他们本国政府的决裂冲突之中。

……

澳门,自从葡国人踏上这块土地直到今天,从来没有表现出典型的殖民地特征。记得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后任外交部长)黄华不赞成对苏联代表团将澳门和香港列入需要解放的殖民地名单上,指出它们属于中国领土,只是体制不同而已。

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耶稣会在澳门创立了远东第一所大学,成为在中国宣传西方文化的中心和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传播站。^⑦

此声明有意识地将葡萄牙与英、法等殖民者形象区别开来,强调澳门的“非殖民地特征”。吴卫鸣、陈炳辉也指出：“在过渡期的澳门历史境况中,由于葡国殖民时代结束前后的正常影响,以及澳门政府的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进程,澳门本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渐渐出现了一套

崭新的历史文化论述。1979年,中葡经过协定,宣布澳门不再处于殖民地的政治地位。而是一个在‘葡国管制下的中国领土’……一时间,整个澳门的城市形象,迅速地由一个‘在东方的欧洲城市’转变为一个‘东西方交汇的城市’”^⑧。

葡澳当局被迫实行的“新政策”,试图从文化入手,开展新的历史建构,改变殖民政府的殖民形象。《文化杂志》的创办充当了葡澳当局展开“新叙述”的主要媒介工具。1999年之前,由葡人主导的《文化杂志》所刊载的绝大部分文章避谈政治和殖民话题,竭力夸赞澳门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传播站”。这确实改善了葡萄牙在中国和澳门的殖民形象,同时《文化杂志》关于澳门历史、风景和城市街景的发掘和介绍,也让澳门人对本土文化有了新认识,培养了殖民地人民的本土认同意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禾在《帝国的政治》一书中指出,西方人在中国的“负面形象”恰恰肇始于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以致“当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时候,他不得不费神地扭转安德拉德等葡萄牙人给民众留下的恶劣印象”^⑨。

二、文化殖民主义:“回归”前《文化杂志》的“澳门叙述”

葡澳当局的“去殖民化”政策其实并非是真的为了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宣扬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之城”的背后仍然是一种浓厚的“殖民意识”。只不过,这不是一种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借助于文化话语来灌输、通过文化叙述来实现的殖民文化,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仍然是“文化的施主”。“葡萄牙人成为文化的施主,驱除了后殖民时期的成见;又可以视为后殖民时尚的预演,预祝殖民篇章的结束。”^⑩

借助创办《文化杂志》以及兴建中葡友谊纪念碑等活动,葡澳当局首要的任务是推行葡国文化、宣传葡国意识。官龙耀长期担任《文化杂志》的主编。在任时,官龙耀主要依靠文德泉神父、潘日明神父等葡人为杂志撰稿。文德泉神父等人一直从事整理、收集有关澳门的历史文献的活动,他们对澳门的历史书写看似客观公正,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多选用与葡萄牙相关的资料,漠视中国文献的存在价值,并通过话语修辞和文化想象,美化葡萄牙殖民者。例如罗德礼·泰克曾在《文化杂志》发表《中国和葡萄牙的海上策略》一文,比较了明朝时中葡“海上策略”的差异。文章竭力维护葡萄牙的声誉,认为葡萄牙的枪炮“吓坏了”亚洲的海岸”的论点有问题,他强调“葡萄牙的枪炮主要对准摩尔人,很少对着有其他信仰的人”^⑪。1998年夏季号《文化杂志》的封面是一位葡萄牙摄影家所拍的澳门建筑,杂志对图片进行了这样一番“解读”：“从高瞻远瞩的世界史视野去观察,葡萄牙曾经扮演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中介角色,起了东西文化通道和传媒的重大作用。葡萄牙的使命是将希腊和罗马留给人类的遗产分赠给世界各个地方。”^⑫其中的“中介”、“遗产”、“赠给”等词汇,将葡萄牙打扮成一个“仁慈形象”,葡萄牙不是“殖民者”和“侵略者”,而是“施恩者”和“帮助者”。葡萄牙帮助中国皇帝打败了“海盗”,传播了上帝福音和西方文明,“由于对中国皇帝所作的巨大贡献值得记忆,中国皇帝同意把这块盗贼带着赃物躲藏的地方——澳门给他们居住。从这时起,葡萄牙安家落户了”^⑬。在他们看来,是葡萄牙建立了澳门这个城市,使其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之城。澳门的现代成就应该归功于葡萄牙。潘日明神父借助19世纪西方游客的一篇“日记”,竭力歌颂总督罗萨,称其是一个勇于牺牲自我、热爱澳门的总督,他忘我工作,改变了澳门的城市面貌,还“教会”了中国人种树,并在澳门建立起最早的西方学校^⑭。而中国人则是“怀着对我们理政威望的极大敬意在那里学习葡萄牙语”^⑮。历史真是这样吗?显然,这是潘日明神父对中国人的一种“殖民幻想”,想当然地认为

中国人都乐于接受殖民教育。另一位总督亚马留,因为强占华人土地,遭到华人的强烈抵抗,结果被愤怒的中国人杀死。文德泉神父则认为,亚马留之所以“不幸丧生”,是其善意的举动被“少数中国人误解”^⑩。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在维护殖民者形象,无视历史真相,完全不顾殖民地华人的真实感受。

文德泉神父等人借文字书写,将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转变为一种隐性的“文化殖民”,试图让人相信澳门自古就与西方文明有关,是上帝赐予葡人的“上帝圣名之城”。1998年《文化杂志》推出了“澳门四百年城市建筑遗产”的“特辑”,官龙耀发表了如下“感言”：“近十年来,人们走上了发现他人、理解他人的道路,使所有种族中心主义的陋习和偏见眼看被摧毁殆尽。这是一条通往世界大同和人类博爱之唯一乐土的康庄大道。”^⑪他宣称所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已被“摧毁殆尽”,澳门是非种族主义的典范城市。为了配合去殖民化政策,许多葡人学者干脆声称澳门不存在“殖民地建筑”：“因为在这里看不到非洲或巴西非常普遍的建筑特点。”^⑫如此刻意强调澳门建筑的“非殖民色彩”,恰恰说明葡澳当局试图通过“文化叙述”,遮掩殖民历史,从而让澳门人相信他们是“非殖民者”,他们到澳门纯属一种“无私奉献的美德”。其实,“去殖民化”背后恰恰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在官龙耀等人眼里,所谓的“文化”主要是“葡国文化”,《文化杂志》的价值也在于宣扬葡国文化认同。官龙耀对此有清醒认识,他直接强调“文化也是一种战争”^⑬。

葡澳当局正是借助杂志推行“文化殖民主义”,使殖民地人民相信,葡萄牙当局不曾奴役过他们,澳门自古以来就与葡萄牙密切关联,由此对葡国文化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再殖民化”。不过,此文化殖民的企图不仅华人、就连不少葡人也不相信。一位葡萄牙建筑师说,澳门从来就不是“一个得到协调发展的社会”。他认为宣称澳门是中葡人民携手创造之类的话,不过是“一种为政治上的需要而进行的粉饰”。在他看来,中葡之间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从来就没“真正友好过”:

葡中关系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冷冰冰的阶段,因为中国人不信任我们,不信任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信任我们的谋略,不信任我们的承诺;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也不理解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接纳我们。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从来就没有深爱过中国人,事实上我们更注重发展同南半球的人民、特别是非洲人和巴西人的直接关系,因为我们感到发展同他们的关系容易得多。^⑭

葡人建筑学家布尔奈也坚决否定澳门是“非殖民主义”城市的说法,他认为澳门的特色就在于它是“殖民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这些机构及其建筑物,通过它们同城市的关系、它们的形式与建筑风格,明显地既是强加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迁的代表,也是实行这种变迁的工具,并且它们也代表了实行由于帝国的存在从而也由于殖民地的存在而带来的社会与种族隔离。”^⑮

《文化杂志》经常刊登西方旅行家的澳门“旅游见闻”,许多“见闻”充斥了这样的描述:“中国人都是些蛮人”^⑯;“在马六甲看到的人身体瘦弱不堪,还偷窃东西,这是下等人。他们吃饭时(用右手)拿两根筷子。”^⑰中国人被描绘成一群稀奇古怪、不可理喻的族类。在此话语体系中,葡萄牙/澳门、葡萄牙/中国被置于不同的位置上,葡萄牙代表着先进的“西方文明”,澳门和中国虽具有神秘的“异国情调”,但却是落后、野蛮之地。

不过,尽管借助于《文化杂志》等,葡澳当局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殖民”政策,但随着《中葡联合声明》的发表,澳门交还中国已是铁板钉钉之事,这不能不让以官龙耀为代表的葡人越发感到不安。在极力盛赞殖民政府“丰功伟绩”的同时,他们也为葡萄牙在东方衰落的现实感到悲哀。1994年《文化杂志》便发表了葡人Graciete Batalha的一首诗,站在葡萄牙的立场表达对澳门前途的担忧。在作者看来,澳门一直在葡萄牙“母亲”呵护下成长,现在却成了一个不知路在何方的“孤儿”。“慷慨的澳门之子/活着的母亲的孤儿,却这样……/我无声啜泣的人民/却不知路在何方/……”这期杂志的内容特别聚焦了一群所谓的“孤儿”——土生葡人。官龙耀在“编者前言”里高度肯定了土生葡人的历史功绩,称他们是澳门这个港口城市“开拓者、奠基人和建设者,是文明史上最壮观的文化交流的服务者”,称“他们本身是不同种族的产物,并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他们一直效忠葡萄牙国王”^④。他对“土生葡人”群体未来境遇的担忧,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昔日殖民帝国的不甘心。不过,面对现实,为了维护葡国文化,殖民政府也不得不放低姿势,寻求与接管澳门的中国“对话”。官龙耀等人将希望寄托于《文化杂志》,希望《文化杂志》继续担负宣扬葡国文化的重任。葡澳当局官员马若龙更是要求《文化杂志》在新的历史阶段里保持一种“延续性”,并将文化夸大为一种超越政治、民族和意识形态的“体制性”的东西。目的很简单,即希望“回归”后,《文化杂志》仍然充当葡萄牙的“代言人”:

《文化杂志》已是社会学者们共同的园地。这点,至少某些社会学思想家是这样认为的。它在帮助人们认识凝聚人们共同生存的社会体系方面,确起着核心作用。而这一体系是具有处于居于社会之上而不受偶然和突发事件影响的地位。从本期开始,作为一个参与和对澳门文化司署主办的《文化杂志》负有领导责任的我清醒地知道,《文化杂志》是以深远精神构思的,具有永久性,故而,它具有法制的感召力。这正是本届文化司期在此以这一简短出版宗旨想强调的真义。《文化杂志》也将自本期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值此,我首先要提出“连续性”这个词。其次,要提出“信心”这个词……文化的要素包罗万象,也具有根植于历史现象和凌驾于社会暂时转变之上的“体制性”。^⑤

官龙耀、马若龙等人构型的文化想象,希望借助于文化对于澳门进行“再殖民化”,显然不可能被中国人所接受。

三、澳门“回归”与重构“中国澳门”

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归”中国,《文化杂志》也自然“回归”。这从编辑队伍、栏目设置、作者群体和编辑方针上便可以看出。官龙耀于2002年辞去《文化杂志》主编职务,他在任的十余年间,一直坚持以“中文”、“葡文”和“英文”三种文字出版,但2002年卸任后,“葡文版”立刻被取消,只剩下中文版和英文版。回归前后,作者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下图是“回归”前后杂志的“主要变化”:

年份	编辑队伍	出版文字	作者群体	编辑倾向
回归前	官龙耀任主编,以葡人为主的编委会	葡文、中文和英文三种文字出版	葡人作者为主	强调“葡国意识”
回归后	以何丽赞、黄晓峰等华人为主的编辑委员会	逐渐过渡为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	华人作者为主	强调“中华意识”

杂志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去葡国化”，减少对葡萄牙文化的宣传，少谈澳门与葡萄牙的历史渊源；其二，与之相应的是“回归叙事”，欢呼澳门“回归”，重新勾连澳门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官龙耀任《文化杂志》主编时，“办刊方针”很明确，极力维护葡国文化和葡国形象，借助于媒体杂志，处心积虑地将澳门美化为“一个富有西方魅力的独特城市”，借此希望“回归”后，葡国文化仍在澳门得以延续，但“回归”前后，“去葡国化”的进程明显加快。1999年春季号《文化杂志》官龙耀仍任主编，不过这期的“编者前言”却是由中文编辑黄晓峰撰写的。黄晓峰在“前言”中一方面强调澳门是中西交往的“触媒”，另一方面却将叙述的重心转移到“澳门”不再是东方了解西方文明的媒介，而是西方人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触媒”。黄晓峰还抨击了那种将澳门历史仅书写为葡萄牙扩张史的历史观：

澳门史的研究者必须彻底摆脱“殖民地史”的陈旧框架，不能再盲目附和地老是将澳门四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视为葡萄牙扩张史的延续了。正如澳门的主权从来就属于中国的那样，早在明代，澳门就是被当作“化外之地”的一个开放港模式加以利用的。如果以西方或种族中心史观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来生搬硬套所谓的“澳门模式”藉以作为研究澳门过往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框架，那就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原动力，亦有悖于历史辩证前进的客观真实。^{②6}

显然，黄晓峰此论意在颠覆官龙耀等人隐性的殖民主义论调，将澳门重新纳入中华文明的叙述框架中。黄晓峰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以及妈阁庙等在澳门的建立，均足以说明“即使葡萄牙人在这个半岛煞费苦心着意经营的几个世纪里，澳门也从来没有失去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特色”^{②7}。不知彼时主编官龙耀读到此“前言”，是何滋味？另外，黄启臣等历史学家也纷纷撰文质疑殖民政府所强调的对澳门统治四百多年的历史观^{②8}。

1999年之前的《文化杂志》多描写澳门与葡萄牙的历史渊源，贾梅士、大三巴牌坊等与葡萄牙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被大书特书。在1998年“澳门四百年城市建筑遗产”的两期“特辑”中，科斯塔、费尔南德斯等人所介绍的澳门城市建筑，基本都是葡式建筑，中式建筑很少被提及。但1999年后随着华人作者群的增加，大量关于中国的历史、艺术、建筑、人物的知识被系统挖掘出来（1999年春季号的《文化杂志》竟没有一篇葡人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叙述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并努力证明黄晓峰在“编辑前言”里所说的“澳门的主权从来就属于中国”的说法。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境遇并没有内在的悲剧性、喜剧性或传奇性。历史境遇也许全部具有内在的讽喻性，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解释它们。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变成一个喜剧境遇。”^{②9}在中国叙事视角下，澳门的前途一片光明，并不像官龙耀等人所说的那么“黑暗”。1999年夏季号《文化杂志》的“编者前言”仍为黄晓峰执笔，这时距离中葡交接时间更近了，黄晓峰这样记叙他的“兴奋之情”：

我们正在凝神屏息谛听澳门回归祖国的倒计时钟嘀嗒嘀嗒、一分一秒接近零点的终止时刻。澳门居民终于在这种难以表达亦无法描摹的一弹指间、一霎眼间、一刹那间的历史关键时刻，亲身感受到并且真心领悟到如此和平而安宁地发生于澳门这一方莲花风水宝地对一次迅速而永远不可逆转的历史场景的迭变。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一种近乎自天而降的十分庄严神圣的感觉，就像平缓起伏的大

潮,在泪花闪亮的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涌动,连成一片,无涯无际,澎湃浩荡,不可遏制。那就是多灾多难不断抗争的中华民族百年来掀起的解放祖国走向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历史大潮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划时代的感应和群起呼唤的振奋。^③

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随着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而达到顶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铨将申遗成功归为“澳门回归”和“祖国的关心”^④。《文化杂志》也推波助澜,盛赞“在澳门申报世界遗产的进程中,中央政府一直给予澳门大力支持,澳门同胞从中深切体会到祖国的温暖,为之深受鼓舞”,并指出申遗成功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在于,增强了澳门市民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中国第三十一处世界遗产,必将加大澳门市民对澳门所归属的伟大祖国及其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产生更加深厚的归属感与凝聚力”^⑤。华人学者姚风更是以“亲身体验”,指出澳门虽然有大量西方文化元素,但它们都已经“入乡随俗”,变得相当“中国化”,至于澳门的中国人则更是完全认同祖国:“他们是那样的淳朴、实在,那样热爱着自己的祖国。街道上不乏欧式建筑,少数餐馆里也卖着我以为是相当中国化了的葡萄牙餐,但是这里我极少碰到那种自以为已欧化成‘高等华人’的傲气和意识形态的成见。我不知道澳门人对于意识形态知道多少,但是他们至少从文化上从民族归属上完全认同自己的国家。我完全相信他们也是信心百倍地迎接回归。”^⑥

总之,在国族话语的支配之下,《文化杂志》改变了殖民时代以葡国文化为主的叙述方向,利用各种文字、图画的历史叙事,迅速将澳门重新纳入大中华版图之中。

四、澳门“本土意识”的苏醒

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中葡两国的关系决定了《文化杂志》的主要叙述立场。在葡澳时代,《文化杂志》努力维护葡萄牙及其文化,宣扬澳门与葡萄牙的天然联系;“回归”后则在民族话语的支配下,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重新构建澳门与中华民族的血脉关系。

在这样的政经结构中,到底什么是澳门文化,什么才能代表澳门的城市形象?有时反倒模糊不清。许多澳门人意识到了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在热烈期盼澳门“回归”之前,有人已开始思考什么是澳门自身的文化。《文化杂志》的中文编辑黄晓峰在1991年已提出“澳门文化”问题,他意识到国族话语的“强势介入”,将澳门整体纳入民族、国族这些“大叙事”结构中,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导致忽略澳门人自己的“真实感受”:

澳门历史的复杂性亦表现为现实的丰富性,这也相对深化了澳门文化的内涵。然而,并非有多少澳门文化人对澳门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感的,而澳门知识青年一代(新世纪澳门社会的中间分子)对澳门的过去与未来的认同,似乎仍处于两难的游离状态。最现实的一件事,即澳门的回归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澳门人都一厢情愿的,因为这种历史的飞跃关系到澳门人缘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由东西方长期的逆向交往而形成的澳门的独特的文化色彩是否能保存的问题。^⑦

这段话与黄晓峰之前为《文化杂志》撰写的“编者前言”相比,似乎更体现出了他个人对“澳门问题”的思考。他意识到,“回归”并非是所有澳门人翘首期待之事,澳门文化亦非某国专属。2011年《文化杂志》“春季号”是一组澳门诗人的“专辑”,“专辑”中多首诗歌都表达了对澳门在

中葡两国的政治夹缝中的生存窘境,表达了对缺乏独立自主现状的不满、无奈之情。贺绫声的《小市民没有梦没有梦只有低头》感慨澳门人身份的混杂:“福建人/中山人/澳门人/土生葡人/什么人(Rap 那么多意志四处激射/而我们却在这里生活)。”^⑤诗的标题告诉读者,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无论何种身份的小市民,为了生存,都“只有低头”。澳门女诗人林玉凤则在《我来自这样的一个城市》中将澳门描绘成在不同力量的操作下,变为一个“没有名字的城市”。“想起雾降临以前/聚焦镜正在寻找/镁光灯也在寻找城市/只是我们/记录者和被记录者/都在闪烁发亮的几个瞬间/忘了那个世纪的历史/忘了那个城市的名字,遗忘啊遗忘/记录者和被记录者。//我来自这样的一个城市/没有名字/如此而已/我也没有名字/如此而已。”^⑥为何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正说明了澳门城市身份认同的模糊和无奈。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澳门人也因此“无名无分”,虽然“回归”了,但却又身在“境外”,虽然是“境外”,却又不是“外国”。这种既“内”又“外”,既“外”又“内”的生存现实,让澳门人无法辨清自己的身份。

身份认同的焦虑说明澳门人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符合澳门自身发展的“主体意识”。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澳门的主体意识已开始萌发。1985年9月1日,澳门的一些知识界人士组成了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创办了《澳镜》杂志,学会宗旨是“研究社会,服务澳门”。杂志“发刊词”既不提葡萄牙,也不提中国,而是将澳门放在全球和亚洲格局中,将其视为与新加坡、香港、台湾一样的“全球区域城市”。“澳门历史悠久,史料也多,人文资料丰富,民风淳朴,具独特发展路向,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七十年代以来,澳门经济发展迅速,世界少有,每人平均区域内生产总值(GDP),目前已跻身于世界第50位,在亚洲排名第6位,仅在文莱、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之后,日益受到注意。”^⑦《澳镜》的“发刊词”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澳门“主体意识”的苏醒,研究澳门本土问题成为一个重点。这份学术性杂志虽然难免涉及澳门与中、葡关系的主题,但却努力保持“本土意识”。在《澳镜》第2期上,吴国昌发表了一篇题为《批判“大澳门意识”,重建“澳门问题”》的文章,更为深入地讨论了什么是“澳门意识”。此文在中葡进行第四轮“澳门问题”会谈的背景下发表,显然有所用意,意在号召澳门社会各界在国家政治角力的大背景中,思考澳门自身问题。吴国昌仔细区分了本土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差别,指出“民族意识往往要通过有意的教育灌输和普遍性的符号(如国旗)、礼节(向国旗行礼)和全国性的统一语言而得以维系。本土意识意味着对某一个特定的生活空间有特别浓厚的感情联系,而这种感情往往是比较自然地长期接触具体的人、事、物中滋生出来的”^⑧。此外,他还就澳门和香港的“本土意识”进行了比较,指出“香港意识”包含了高人一等的城市“优越感”,并由此养成了“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意识”。但澳门却不同,澳门不仅交织在不同的政治话语中,而且有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为“参照系”。“对于澳门生活的人来说,处大都市旁边而不能与大城市并肩发展,不能分享大城市同等的物质生活水平,便不难滋生出一种自卑兼自大的自恋态度。”^⑨澳门与香港毗邻且均为殖民城市,但香港是国际大都市,这让澳门“心情复杂”,产生了一种“自大兼自卑”的双重心理。吴国昌把这种心理称为“尖澳门意识”——沉溺于拉丁风情的“大澳门主义”和地方小、资源少、经济规模弱的“小澳门心态”。他对“尖澳门意识”颇为不满,提出要摆脱“尖澳门意识”,将澳门放在一个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语境中,重建符合时代潮流的澳门“本土意识”^⑩。

“本土意识”的加强反映了澳门渴望摆脱各种国家和政治势力的干预,发掘自身存在的价值。特别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香港、北京、上海还是台北,每个城市都在努力“发现自我”,强化本土意识。澳门也不例外。建构“澳门意识”不仅是摆脱国家政治和民族宏大话语的需要,也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1998年《文化杂志》推出的“澳门四百年城市建筑

遗产”特辑中,王世红也撰文强调重视塑造“澳门形象”,摆脱澳门单一的“赌城形象”,从历史文化入手,打造一个“高层次高品位的世界名城形象”^①。他还指出澳门应在全球和区域的城市竞争中“凸显自身”。

立足于本土,从本土出发。原先让澳门人焦虑不安的身份认同和小城等问题,现在反而成为优势。李欧梵以自己的亲身游历在《文化杂志》上撰文指出:“葡萄牙在海外殖民的同时,也被本地文化殖民了,它的产品就是一种自然的混杂(hybridity),但似乎又没有引起什么种族纷争,所以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往往忽视了澳门。”^②而且“身份模糊”反而使得澳门人游离于体制之外,可以自由灵活地穿行于各种制度。2005年7月15日,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推动了澳门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关注,媒体亦大张旗鼓,不仅将申遗成功归咎于“回归”祖国,还从全球与本土的关系切入,将澳门申遗成功看成是澳门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的“封面说明”就满怀激情地宣称:“澳门街”已经是“全世界的澳门街、全人类的澳门街!”^③吴卫鸣、陈炳辉则在《文化遗产、怀旧意识与城市文化形象》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申遗”活动是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凸现自身优势位置”:

在全球化环境下,为了在邻近地区中凸现自身的优势位置,各地纷纷为自身寻找独有的文化论述,发掘过去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作为存在于一地的历史见证,是当代社会寻求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透过它去唤起某地昔日时空的相关记忆和情感,并将它提升为象征某地文化形象的外部特征,以及城市文化内在的组成部分。

今日澳门以旅游娱乐事业为经济的一大支柱,透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去建构一个具备地方文化特色的社会环境,是与邻近地区及在国际范围内保持竞争、并持续发展本地经济特色的最佳手段。而澳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正是要唤起本地市民关注那些使他们有别于其他文化特色,同时亦使外地游客藉此发现澳门存在的独特历史文化。^④

可见,在充分本土化的“澳门意识”里,关于澳门到底是中国城市,还是西方城市,关于澳门的大小等争论,均可搁置一旁。只要澳门本身有特色,有令人骄傲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就可以加强市民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可招揽大量外来游客。

结 语

《文化杂志》自创办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话语权的争夺,国家政治和种族话语主导杂志的“文化叙述”。近年来,在纷繁杂沓的话语环境中,澳门的本土意识得以复苏和张扬。通过《文化杂志》,澳门自身历史、文化和艺术传统得以系统挖掘,各种文字和图片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澳门图像”。正如一位上海教授对《文化杂志》的评价:“重视研究澳门地方历史及文化。澳门城市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其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质。该刊刊载了许多有关澳门城市起源、葡人与土著在城市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澳门回归后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这对于澳门城市本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以及与其他城市史的比较研究,均存有益的参考价值。”^⑤

① 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出版1994年版,第175页。

② 舒静:《澳门中文报业一百年(1840—1950)》,载《澳镜》1986年第1期(创刊号)。

- ③ 施白蒂：《二十世纪澳门编年史（1900—1949）》，金国平译，澳门基金会出版1999年版，第74页。
- ④ 黄鸿钊：《澳门简史》（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31页。
- ⑤ 《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和澳门总督讲话摘要》，载《文化杂志》1987年创刊号（第1期）。
- ⑥⑦ 彭慕治：《联合声明与澳门文化复兴联合声明》，载《文化杂志》1987年夏季号（第2期）。
- ⑧ 吴卫鸣、陈炳辉：《文化遗产、怀旧意识与城市文化形象》，载《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第66期）。
- ⑨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张立华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4页。
- ⑩ 郑妙冰：《文化特色 澳门的身份认同》，载《文化杂志》2003年春季号（第46期）。
- ⑪ 罗德礼·泰克：《中国和葡萄牙的海上策略》，载《文化杂志》1993年第1季度（第13、14期）。
- ⑫ 《封面说明》，载《文化杂志》1998年夏季版（第35期）。
- ⑬ 奥利维拉（Celina Veiga de Olivera）：《略谈澳门》，载《文化杂志》1987年秋季号（第3期）。
- ⑭ 潘日明神父：《百年华人区》，载《文化杂志》1989年春季号（第7、8期）。
- ⑮ 潘日明神父：《十九世纪的澳督与澳门生活》，载《文化杂志》1989年春季号（第7、8期）。
- ⑯ 文德泉神父：《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载《文化杂志》1989年春季号（第7、8期）。
- ⑰ 官龙耀：《编辑前言》，载《文化杂志》1998年夏季号（第35期）。
- ⑱ 科斯塔（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1998年夏季号（第35期）。
- ⑲ 官龙耀：《编者前言：创刊十年》，载《文化杂志》1997年春季号（第30期）。
- ⑳ 菲格拉：《澳门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载《文化杂志》1998年冬季号（第36、37期）。
- ㉑ 布尔奈：《变动与建筑——澳门的建筑与殖民主义》，载《文化杂志》1998年冬季号（第36、37期）。
- ㉒ 《德·波瓦公爵在澳门——1867年2月》，载《文化杂志》1995年夏季号（第23期）。
- ㉓ 托梅·皮雷斯：《东方概要（手稿）》，载《文化杂志》1997年夏季号（第31期）。
- ㉔ 官龙耀：《编者前言》，载《文化杂志》1994年第3季度（第20期）。
- ㉕ 马若龙：《宗旨》，载《文化杂志》1992年第3季度（第9期）。
- ㉖㉗ 黄晓峰：《编辑前言》，载《文化杂志》1999年春季号（第38期）。
- ㉘ 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再审视（1553—1999）》，载《文化杂志》2000年夏季号（第41期）。
- ㉙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 ㉚ 黄晓峰执笔《编者前言》，载《文化杂志》1999年夏季号（第39期）。
- ㉛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铨先生致辞》，载《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第60期）。
- ㉜ 《澳门历史城区》，载《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第60期）。
- ㉝ 姚风：《让你忘却归程的地方》，载《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第60期）。
- ㉞ 黄晓峰：《澳门的文化视野——世界与中国》，载《文化杂志》1993年夏季号（第15期）。
- ㉟ 贺綾声：《小市民没有梦没有梦只有低头》，载《文化杂志》2011年春季号（第78期）。
- ㊱ 林玉凤：《我来自这样的个城市》，载《文化杂志》2011年春季号（第78期）。
- ㊲ 《发刊词》，载《澳镜》1986年第1期。
- ㊳㊴㊵ 吴国昌：《批判“尖澳门意识” 重建“澳门问题”》，载《澳镜》1987年第1期。
- ㊶ 王世红：《试论塑造澳门城市文化形象》，载《文化杂志》1998年秋、冬季号（第36、37期）。
- ㊷ 李欧梵：《澳门国际音乐节随笔》，载《文化杂志》2007年夏季号（第63期）。
- ㊸ 《封面说明》，载《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第60期）。
- ㊹ 吴卫鸣、陈炳辉：《文化遗产、怀旧意识与城市文化形象》，载《文化杂志》2006年秋季号（第60期）。
- ㊺ 顾伟民：《阅读澳门〈文化杂志〉》，载《文化杂志》2002年秋季号（第44期）。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苏州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容明